



章培恒传略

骆玉明



章培恒先生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生在浙江绍兴。三岁时就随父母迁居上海，不曾来得及对这座历史名城留下什么记忆。不过，他的性格——耿直、顽强、执着和内在的深厚热情，颇近于几位绍兴的前人。或许，他不久前为复旦中文系毕业生题写的赠语也间接地说明了自己：“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灾厄，毋改初衷。”

他的父亲在乡下略有一些土地，在上海有一家酒店，可以算是中等家庭吧。父母的文化水平都不高。由于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照例格外受到珍视。其结果是关在家里不许出门，因为上海的车辆太多。闲得无聊，在识了一些字以后，便开始读旧小说。大约从七岁开始，他把《七剑十三侠》、《江湖奇侠传》之类的剑侠书读了不少，带来的好处是培养了阅读能力。九岁还是十岁时，读了巴金的《家》，在心中引起了感动。他发现自己的家庭和小说所写的有许多相近之处。这可以算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文

学。

章先生从一九四〇年六岁时开始上学，从二年级起读，上了五年。初中二年级所就读的上海建承中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这所学校对语文非常重视，而且有出色的教师。当时作家许杰、孔彦英（笔名司徒宗，茅盾夫人的弟弟）都在这里教书。教师并不死板地讲解课文，而是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学习。学校每个学期都有读书竞赛，标准是每周阅读字数的多少。读得最多的，每周达到三、四百万字。章先生的记录是二百万，没有取得获奖资格。他回忆自己对文学发生兴趣，接触较早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了建承中学，受了任课的孔彦英老师的影响。这个学校的另一特点是政治进步，校方对学生运动公开支持。这样，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就随着高中同学上街游行，他也是从这里开始参加了学生运动。父母发现这个地方颇为危险，下令要他转学。于是转到比较保守的复旦中学。但是由于金元券风潮引起物价飞涨，学校伙食越来越差，学生也愤起绝食抗议。他被当作魁首之一受到记大过处分，于是再转到孟贤中学。这已经到了1949年。在孟贤中学他仍然热心于进步学生运动，并和地下党发生联系，在当年的五月——上海解放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十五岁。接着是紧张的生活：组织进步学生应变护校，迎接解放。解放了，参加宣传队，参加反银元投机的斗争。在黑暗之中，他和千万人一起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希望生命得到有力的实现。

在孟贤读了一年高中，下半年章先生又转校考入上海中学读高二，因为上中的质量要好一些。一九五〇年初，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散文，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字。当时他对文学创作有浓厚的兴趣，而文学创作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于是想到读新闻，当记者，借此积累生活素材。这一年没读完高中，他就投考了私立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但在民治的时

间只有一年，一九五一年他就转校到上海学院读中文系了。为什么又不想当记者了呢？原来在《文汇报》实习期间，他奉派去参加一次重要的采访，结果被《大公报》两位记者拖住在一家小店喝汽水，耽误了时间——《大公报》早有另两位赶到现场，这两位是专门拖别家后腿的。第二天《大公报》报导了一个整版，《文汇报》却只有买来的几百字的简讯。他失败了。失败使他感到记者似乎需要一种特别的素质，而自己的性格与此不合，这才决意转学中文。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上海学院并入复旦大学，他也随之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

在学生时代以及稍后的时期，章先生主要爱好和钻研的学科是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对鲁迅尤有浓厚的兴趣。大致到一九五五年遭遇变故以后，作为专门研究就改变为古典文学了，但他在这些方面的兴趣始终没有消退。鲁迅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包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对他一直有明显的**影响**。

大学时代的同学回忆章培恒当时的情况，记忆最深的，一是他读书的勤奋，再就是他的义气。这可以说是旧道德的遗存，更是性格强烈的一种外现。重然诺，轻货财，自奉俭薄而所费甚多，为人谋则忠其事，无论安危，必有其终，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章先生这种为人的态度到后来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添上一层年龄的色彩。无论对师长、对同辈、对学生，他都待以赤诚之心。他所许诺于旁人的事情，哪怕到终了会给自己带来大损失而于对方未必至关紧要，他也要做到底。

一九五四年二月，章先生在复旦中文系毕业，正是二十岁。留校担任中文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他在这个岗位上除了自己读书以外，没有留下多少成绩。某位老教授这样形容当时的章培恒：

“一个年轻人，成天把自己往办公室里一锁，到了晚上就开门走路。一问，原来是书记。”看来他还不习惯做官，命运也没有给

他留下习惯的时间。一九五五年初，发生了胡风案件，他被牵连进去。到五月他就被隔离审查，十一月开除党籍，十二月调至图书馆工作。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此后的艰难道路又是如此漫长。这也许可以算一个尾声：直到一九七八年，某位人士与章先生发生文字争执时，还敏锐地把一个不相及如风马牛的学术问题与章先生的“胡风文艺思想”联系起来。

这一个打击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章先生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他有时独步于校园，四顾茫然，不知所往。但他终究没有在挫折中沉沦，而努力发愤起来。发愤，这是不屈的精神对人生的顽强追逐。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一年，章先生除了在图书馆做规定的编目工作外，所有时间他都沉浸在浩瀚的书海之中。夏天最闷热的日子里，他也可以钻在蚊帐中读书到深夜。汗水湿透了衣衫床席，他漠然无知。一年之后，中文系又把他调回，分配给蒋天枢教授当助教，并由蒋先生指导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由此转变了学业的方向。蒋先生是文史学界巨擘陈寅恪先生最信赖的门人，治学严谨而不轻于著述。他对章培恒的指导也严格遵循自己的道路：由小学、史学入手。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由此却可以奠定坚实的基础。于是，章先生从《说文》、《尔雅》、《通鉴》和四史开始，一部一部、一字一句地咀嚼过去。读书的方法大抵也依各人的性格而异，章先生的态度是一切都不肯苟且，一切都不愿含糊。颖悟的资质，却用愚拙的方法，这才积蕴了沉实厚重的学问。此后，他又顺流而下，博览群书，广泛而有重点地涉猎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同时对目录、版本、校勘等工具学科，也细心探究。就后来章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而言，是元明清戏曲小说。但他对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古汉语、史料学诸方向都有相当的造诣，能够从整体的立场来看待个别、具体的问题，能够随时在一些不同的领域中打开新的门径。而且，文艺理论的修养和外国文学的知识，更使他的学

识具有多面性和整体性。

不用说，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牺牲。一九五五年的时候，他才二十一岁。几乎一切使年轻人的生活显得轻松欢快的东西，他都没有时间去品尝。他的青春年华坚硬而沉重。

在刻苦钻研的同时，他于一九五八年走上讲台，讲授中国文学史。一九六〇年，被提升为讲师。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高校中从事集体科研的风气很盛，当时才二十多岁的章培恒先生已经成为复旦中文系集体科研的骨干。他先后参加过《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李白诗选》等书的编写与选注工作。一九六〇年起他又参与编写《辞海》中国古典文学部分，后来并担任分科主编之一，主持古典文学条目的最后定稿。在这一系列工作中，他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取得一起工作的同志的充分信赖。章先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是与刘大杰先生合作、一九六三年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的《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文章从剖析金圣叹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矛盾入手，对他在《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中所显露的矛盾作出合理的说明，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六十年代中期，在学术界就晚清谴责小说的评价问题开展讨论时，章先生接连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国内引起颇大的反响。其中《关于李伯元作品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光明日报》刊出后，《文汇报》、《解放日报》、《羊城晚报》都曾转载。岁月如流，他又缓慢而有力地站立起来。在新的园地里为人民辛勤耕耘，“如农人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对章先生这样一个被认为曾经犯过严重错误，而又勤奋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应当如何看待，“文革”前在学校内就常常引起争执。有的同志认为他可以重新发展入党，然而有时候他却连参加高考阅卷的资格都被取消。“文革”开始了，一切都

急剧地向“左”翻滚，他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胡风问题重又提起，而且加上了新的罪名：“修正主义党委的白专标兵”。于是他很早就被关进了“牛棚”。即使后来被开释出来，他也一直受到沉重的压力。他越来越习惯于沉默，并且明显地显得衰老——在十年动乱期间，他的年龄还只是三十二至四十二岁。这一切当然和个人遭遇有关，但也是缘于对国家动乱的困惑忧思，对荒谬现实无法理解的痛苦。章先生平时很少谈论政治问题，只是在他的心底，深蕴着如少年时代一般对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怀。

当党把国家重新引向光明通途的时候，多少个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转折。一九七九年，党组织改正了对章培恒先生的错误处理（当时胡风问题还没有正式得到解决），恢复了他的党籍。他一次交纳了将近二十四年的党费，很难说这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同年，评定职称的工作恢复，他被提升为副教授。也是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凝聚了他多年心血的《洪昇年谱》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著作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着手，历时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定稿。当初决定编撰这本年谱，本意是为了在学习古典文学的同时作独立研究的尝试。而作为清初两大戏曲家之一的洪昇，当时还很少有人研究，因此被选为尝试的对象。这是一项带有拓荒性质的工作。章先生一切从头做起，在上海遍查了有关史料，又自费去杭州、南京、北京，只要有一丝线索，无不探寻到底，终于使这部年谱表现出严密、深入、明晰的治学特点。它引用了几百种书籍，其中包括许多罕见的材料，作了大量考证，基本上搞清了有关洪昇家世、生平、交游、创作、思想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描摹出清朝前期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中北京和江南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生活风气，既为洪昇研究提供了完整而可信的资料，还可以使读者由此了解到一个相当广大的社会面。一位研究洪昇的同行在书评中称扬它“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而且此书并不停止于提供材料，对

洪昇研究的许多问题，也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使它在各种年谱中别具特色。比如关于《长生殿》是否具有反抗满清统治的民族意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通常的看法是肯定的，《年谱》则基于大量材料，根据洪氏生平思想的一贯状况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洪昇年谱》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一九八〇年的《中国百科年鉴》把它列为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香港《大公报》也发表文章给予很好的评价。当然，这样一部专门著作的读者面不可能太大，但任何一个读过本书的人，不会不感觉到它的过细的功夫。

从一九七九年十月到一九八〇年十月，章培恒先生应邀去日本神户大学工作一年，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日本的汉学一向很发达，章先生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大陆去日本任教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因此颇受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但神户大学的学生爱听他的课，有关教师也对他高度称誉。神户大学览久美子教授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介绍说：“在听过他的课、跟他接触较深的人们中，没有不被其诚实的人品和深湛的学诣所吸引的。”当任教期满时，神户大学校长须田勇先生写信给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要求延聘，信中说：“章先生的博学、诚实的人品和充满热情的教学态度，受到我们每一个教职员和学生的敬爱。”但章先生不愿久留异域，准期归来。

回国后，章先生担任了复旦中文系副主任，并晋升为教授，后来又担任系主任。他还与其他同志一起筹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同时他又被推举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成员和上海市同类机构的顾问。在担负了众多的行政与社会工作、各种事务与活动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参加教学，除了指导研究生，每学期还为本科生开设一至三门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专题讨论、《西游记》研究、晚明文学研究、

古籍校读等。除了古籍校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以基础训练为主的课程外，其它几门课都融贯了章先生自己多年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以富于独创性与启迪性为特征，格外受到学生的欢迎。在一些史实问题上，比如屈原的生平、五言诗的起源、《西游记》的作者等等，他都尽可能发掘和梳理最原始的材料，提出新的看法，与同学一起进行讨论。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他对因为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而历来受到推崇的作家、尤其是那些标榜儒家正统文学观的作家的看法，大都异于通常的认识。在章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它缺乏反抗性和叛逆色彩，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来少有敢于抚哭叛徒尸体的弔客。政治和伦理色彩浓厚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点，但这种特点是与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相联系的，因此不值得给予太多的肯定。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尽管应该承认他对现实作过尖锐的批评，但他又是很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和欢迎的。类似的情况，如以原道、征圣、崇经为文学最高原则的《文心雕龙》，以“文以载道”为口号的唐宋古文运动，究竟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起了何种作用，还有许多可以探究的问题。相反，那些多多少少表现出反传统色彩的作家，在章先生看来却更值得引起注意。

除了章先生的学识，他的人品，尤其是他对青年人的谦和、真诚与热情，也受到许多学生的崇仰。他定期为学生辅导、指导学生兴趣小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也绝不失约。他还经常约请学生分批上门，和他们一起讨论教学与科研、社会与人生。逢年过节，他会想到那些没有回家的外地同学，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度过一天。为了在繁忙之中抽出必要的时间备课，他多次饿着肚子走进课堂。学生也喜欢找他，和他讨论各种问题，请他审看文章。对此，章先生从不拒绝，而且毫无不悦。他热切希望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希望年轻人超过自己。

九七六年以后，章培恒先生陆续发表了多二十多篇学术论

文。其中比较集中的，是一批关于元明清小说的考证文章。注重实证，精于考据，原是章先生承之于前辈学者的治学特点；追根究底，不为公认常识所囿，则是章先生一贯的思维习惯。这些文章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推本原始，穷委竟源，或是发现了长期未被注意的问题，或是推翻了被视为已成定论的看法，或是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意见。比如《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和《聊斋志异三会本序》二文，指出目前通行的十六卷本和十二卷本《聊斋志异》都不符合蒲松龄的原意，探索了《聊斋志异》原来的编排次序及写作过程，搞清过去研究者没有发现的问题，对研究蒲松龄的思想发展和创作经过具有重要意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一文，以很少引起注意的小说原文中的小字夹注为主要依据，经过深入探讨，对作者罗贯中的生平、思想，特别是他的生活年代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颇为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称它为近年来《三国演义》研究获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儒林外史原本应为五十回》和《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二文，考证目前所见五十五回本《儒林外史》中有五回系后人窜入，并加以具体说明，这也是独特创见。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个说法始于清人，而后得到鲁迅、胡适等权威学者的肯定，遂被视为定论。章先生《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作》一文，则以细密的考证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早期的《西游记》刻本均不署作者姓名。《淮安府志》虽著录有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一种，但并未指明这是小说书，因而不足据以判断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而且清初人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将吴承恩《西游记》归入地理类，进一步说明它并非小说。文章继而小说《西游记》的方言进行考察，指出其中很少有淮安或苏北方言。这样就否定了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一说的可靠性。章先生的新观点也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支持。《聊斋志异》、《三国志通俗

《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西游记》都是中国小说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品，历来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重视。章先生在不算太长的时期中对它们一一探讨，分别取得了重大突破，足以说明他的学问功底的深厚和目光之敏锐。这些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引人注目，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没有人能够提出有力的根据加以否定。此外《辩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也以坚实的论据、严密的考证，彻底推翻了很久以来就被视为定论的《辩奸论》系邵伯温伪作的看法。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它颇可以反映章先生研究范围的广阔。应该指出，章先生虽然擅长考证，却并不认为考证是最高的学问。他更为赞赏有根据、有识力、有理论深度的文章。那些既缺乏材料基础，又缺乏思辨能力，只是空泛议论，或者莫名其妙地标异立新的文章，是他至为讨厌的。

一九八二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章先生写作了《试论鲁迅对中国文学遗产的观点》一文，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谈到中国古典文学，往往只是强调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和继承这一丰富遗产的巨大意义。人们在论述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时，往往也把他的观点说得和今天通行的观点差不多，或者认为鲁迅早期的态度比较偏激，后期则作了自我修正。章先生指出这不符合事实。对中国古典文学总体的思想倾向，鲁迅的评价始终不高，而且后期的批判较之前期更为尖锐。他在一九二五年向青少年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到了后期非但没有修正，而且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关于鲁迅的观点，章先生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看待鲁迅的观点。章先生认为它仍然值得我们重视。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封建时代，而欧洲文学的优秀作品则主要产生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作斗争的时代，与前者相比，后者表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倾向，也具有中国古代文学所缺乏的抗争与奋

斗精神。所以鲁迅说，谈中国书往往使人消极、遁世，而读外国书则催人奋发有为。作为一个以毕生精力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章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过长期的反复考虑。这不仅仅是一个古典文学的问题，而且牵涉到我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认识。

近年来，章先生对明代文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迄今为止多数人对明代文学的看法，是在没有对明代文学史料进行认真清理的情况下得出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受了传统文艺观，尤其是清人对明代文学评价的影响。实际上，明代文学充满了新的思想萌芽与旧的思想传统的冲突，其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的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他在《论金瓶梅词话》和《试论“两拍”的思想倾向》两篇论文中，着重从明代市民阶层的思想特征来分析这些小说，指出简单化地把明代小说中的某些内容情节指为“糟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用抽象的伦理道德判断去看待历史现象，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些意见，对明代文学研究具有启迪意义。目前，章先生正在写作《明代文学史》并主持编纂《全明诗》，力图以此为基础，推进对整个明代文学的研究。

很少有一个认真的学者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成功，章培恒先生也是如此。他对已有的一切都是不满意的，这种观念驱使他不断地作新的探索。在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